

初编13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小说的罪与 救赎思想

侯朝阳◎著

基督教文化
研究丛书

何光沪 主编
高师宁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何光沪 高师宁

初编 第 13 册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罪与救赎思想

侯 朝 阳 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资料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罪与救赎思想／侯朝阳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2+194 面；19×26 公分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初编 第13册）

ISBN 978-986-404-206-7（精装）

1.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2. 学术思想 3. 文学

240.8

104002091

ISBN-978-986-404-206-7



9 789864 042067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初编 第十三册

ISBN：978-986-404-206-7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罪与救赎思想

作 者 侯朝阳

主 编 何光沪 高师宁

执行主编 张 欣

企 划 北京师范大学基督宗教文艺研究中心

总 编 辑 杜洁祥

副总编辑 杨嘉乐

编 辑 许郁翎

出 版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社 长 高小娟

联络地址 台湾 235 新北市中和区中安街七二号十三楼

电话：02-2923-1455 / 传真：02-2923-1452

网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罗文化出版广告事业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价 初编 15 册（精装）台币 28,0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罪与救赎思想

侯朝阳 著

作者简介

侯朝阳（1979- ），男，河南郑州人，现就职于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学科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关系、圣经文学。

提 要

本书主要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涉及的最为重要的两大神学思想命题：罪与救赎，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力图揭示出作家的基本观念，在此基础上凸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越了所谓的环境决定论、机械生存论等平面的尘世之维，主要从纵向的、“上帝一人”的神性维度探究人的灵魂深处的真实处境，“破解人性之谜”。在他笔下，罪被描述为人悖逆上帝、失去上帝信仰之后的本然处境，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力量都将导致罪的产生；罪具有普遍性，无人能够摆脱，而且在罪责上人类应该相互承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自由来探究人的悲剧命运，揭示出罪恶的根源在于自由这一真理。他不只看到在自由之中包含着人的全部尊严，而且窥见了自由中藏裹着人性的秘密，于是将人引至原初的自由那里，用绝对的自由、终极的自由来探究人性，察看人心。他相信，人通向自由的道路是悲剧的道路，人会受到恶的诱惑，制造混乱和苦难，但不能因此而否弃个体生命的存在或者取消人身上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罪所带来的恶果：人悖逆上帝而陷入罪恶之中，也就疏离了上帝和他者，造成自我的隔绝与封闭；同时生命个体也就丧失了自由，完全被恶奴役，人的心灵不得不为此承受无尽的惩罚和磨难。然而他又认为，人在吞下罪的恶果时可能会带着罪感重新自由地回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因此，罪恶并非必然是人的最终命运。

陀思妥耶夫斯基秉持的是皈依基督、回返“根基”和遵循“诚爱”法则“三位一体”式的救赎观。皈依基督的救赎之路同时也是回返“根基”和遵循“诚爱”的生命实践之路。只要真正地回转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方向，也就意味着回转到所有方向，赎罪就成为可能。然而救赎并非轻易实现之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人物都面向着救赎的可能性或走在救赎的途中，救赎终不能止步和完结。



目 次

绪 论	1
0.1 通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路	1
0.2 为什么是罪与救赎	3
0.3 研究现状	5
0.3.1 俄罗斯学界的研究	5
0.3.2 西方学界的研究	10
0.3.3 国内研究状况	19
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罪恶抗争的一生	25
1.1 第一阶段：从童年到“死屋”时期	26
1.2 第二阶段：从回归彼得堡到去世	32
第二章 罪之遍在	39
2.1 从天堂坠落的有罪的生命	40
2.2 罪的隐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毒蜘蛛	47
2.2.1 蜘蛛、虫类的隐喻	47
2.2.2 嫩叶	52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人们	53
2.3.1 “恶人”群像	54
2.3.2 人神	60
2.3.3 有罪的“圣人”	71

2.4 “已经没有罪孽”？	74
2.4.1 罪孽的否认者	74
2.4.2 “已经没有罪孽”说的思想根源	75
第三章 罪与人的自由	79
3.1 自由	80
3.1.1 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的绝对价值	80
3.1.2 原初的自由	84
3.1.3 “个体思想者”的自由	87
3.2 罪与恶	92
3.2.1 罪的恶果	92
3.2.2 罪的“辩证法”	101
3.3 苦难	105
3.3.1 “孩子的眼泪”	105
3.3.2 苦难的价值	107
第四章 救赎之道	113
4.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形象	114
4.1.1 胜过死亡法则的基督	116
4.1.2 拥有美的面容的基督	122
4.1.3 表达自由之爱的基督	126
4.1.4 拒斥“斧头”之义的基督	129
4.1.5 “俄罗斯的基督”	133
4.2 回返“根基”	137
4.2.1 俄罗斯人民作为“根基”	138
4.2.2 陀氏小说中人民的画像	141
4.2.3 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人民	144
4.3 遵循“诚爱”法则	149
4.3.1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诚爱”	151
4.3.2 “诚爱”与“欲爱”之间	158
4.4 救赎的实现及未完成性	164
4.4.1 救赎的实现	165
4.4.2 救赎“在路上”	172
结语：“上帝国成为盼望”	175
参考文献	181
后 记	191

绪 论

0.1 通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路

自 1846 年《穷人》面世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创造的思想盛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学者和思想家。尽管人们理解和接受陀氏的路径和偏好不尽相同，但凡深入阅读过他的伟大著作的人们，无不经受灵魂的震荡、思想的砥砺、心灵的痛苦和审美的快感。一百多年来，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进陀氏丰富而复杂的文本世界，寻觅合己的需要和满足，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研究成果，从而使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得以敞开、复活和再生。

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主要有四条进路：社会学派、宗教哲学学派、精神分析学派和诗学研究学派。社会学派主要师从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看重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偏重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作品的思想性。高尔基（Горького，1868-1936）、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叶尔米洛夫（В.Ермилов，1904-1965）、弗里德连杰尔（Г.М.Фридлендер，1915-1995）和格罗斯曼（Гроссман，1905-1964）等人的研究可以归入该派。以索洛维约夫为（Соловьёв，1853-1900）肇始出现了一大批将陀氏作品的宗教主题、思想和哲学理念作为重点的研究者，白银时代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1874-1948）、舍斯托夫（Шестов，1866-1938）、伊万诺夫（Иванов，1866-1949）、罗赞诺夫（В.В.Розанов，1856-1919）、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1865-1941）以及德国哲学家劳特（Reinhard

Lauth, 1919-2007) 等人都属此宗教哲学学派行列。弗洛伊德·西格蒙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 等学者强调作家的癡病症和异常体验对作品人物病态特征的决定作用, 引入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他的作品或者将他作为个案纳入精神分析的整个理论体系, 这些研究可以归入精神分析学派。以上这些学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思想内容方面。诗学方面的研究以巴赫金 (Бахтин, 1895-1975) 为代表: 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的特色”¹的展示, 对陀氏小说用时空体理论进行的精彩分析, 在 20 世纪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当然, 以上不同学派的研究常常是交叉扭结在一起的。

以 80 年代为界, 中国学者对陀氏的接受和研究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社会学角度和注重阶级分析的论调主导了 80 年代之前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80 年代以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逐渐步入多元并立、开放深入的格局。²特别是近十多年来, 伴随着研究热情的逐渐高涨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著作汉译工作的推进, 陀氏研究开始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第一, 宏阔的文化视野与微观研究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譬如, 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³一书既着重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历史视角去分析陀氏作品的深层意蕴, 又对关键的字词和语句进行了精彩的语言学分析, 二者相得益彰, 极有说服力地扩展了中国学界对陀氏作品的理解。第二, 更为注重综合性研究。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⁴最为典型。该书试图廓清陀氏作品的诗学原则与东正教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 对一些诗学原则重新进行评估, 揭示出渗透和融入陀氏小说形式特质中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因子。第三, 在中国文化视野中进行比较研究较为盛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田全金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和郭小丽

1 [俄]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 白春仁、顾亚玲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第 360 页。

2 关于陀氏作品在中国的研究、汉译与接受状况可以参考田全金:《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第 20-97 页。

3 赵桂莲:《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4 王志耕:《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赎思想——兼论与中国文化思维的比较》⁵等专著。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陀氏在华接受史方面的研究成果。⁶第四，注重研究史的梳理：开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年鉴的编订工作，着手对百年来中国学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编目⁷。总之，陀氏研究在中国正走向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发展阶段。

0.2 为什么是罪与救赎

必然有无数条道路通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由其文本世界的多面性与多元性所决定。单就思想层面来说，正如考斯所言，“没有任何一个作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一身汇集了如此相互矛盾，如此相互排斥的不同概念、论断和评价。”⁸恩格尔哈特（Б.М.Энгельгардт，1887-1942）将陀氏的小说界定为“思想小说”，即描绘思想本身的小说，这大体上是适当的；他认为“支配主人公意识和生活的思想”按性质分属“环境”、“土壤”、“大地”等多个领域的看法也是高屋建瓴的。巴赫金则使用“复调小说”这一术语来界定陀氏小说在结构方法上的特点，认为与之紧密相应的是小说在思想上的多声部性。在他看来，“教堂”这一意象勉强可以用来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世界的多元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为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向往又能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世界观的形象，那就是教堂，它象征着互不融合的心灵进行交往。聚集到这里的既有犯了罪过的人，又有严守教规的人。这或许可能是但丁世界的形象，在这里多元化变成了永恒的现象，既有不思悔改的人又有忏悔者，既有受到惩罚的人，又有得到拯救的人……”⁹这既反映了陀氏小说极具包容性

5 郭小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赎思想——兼论与中国文化思维的比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

6 如丁世鑫的博士学位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1919-1949）》，山东大学，2006年；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

7 见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卷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8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9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的特征，也从侧面说明走进陀氏的思想世界和整个文本必然充满了挑战。

笔者之所以选择从罪与救赎思想的角度来切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客观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关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犯罪事件，将它们纳入创作素材，而且也从根源上来探究人为何会堕入罪中，又如何可能脱离罪恶、实现救赎。陀氏最主要的几部小说都以人的堕落、犯罪和谋杀作为基本情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罪人形象，作家对罪性的理解也十分复杂和独特。尤为特别的是，与传统律法意义上的犯罪不同，陀氏笔下出现了一些苏格拉底式的形而上的罪犯、一些离上帝最近的思想巨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韦尔西洛夫、伊万等，他们最终要么自杀，要么接受了神圣启示的光照而得以救赎。罪与救赎问题由此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成为把握作家思想最为重要的节点；作家关于上帝、自由、恶、苦难、“人神”和俄罗斯命运等问题的思考均与此相关。将陀氏作品中的罪与救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把握陀氏思想的命脉，从最为核心处破解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两难命题，进而体会其思想魅力。

其次，罪与救赎问题终归是人和人性方面的问题；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罪与救赎的观念，就意味着努力进入陀氏关于人性的探索活动。鲁迅关于陀氏小说“显示出灵魂的深”¹⁰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视为宇宙中最大的奥秘，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揭示这一奥秘。早在18岁那年写给兄长的信中，陀氏就表达了对于人的命题的兴趣：“人是一个秘密，要识破它。如果你一生都在识察这个秘密，那你就别说你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¹¹这位作家完全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探求人性奥秘的，其小说创作浓缩着他经由持久的“研究”热情领受到的生命之道。

最后，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罪与救赎思想的理解尚有深化的空间。要真正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要深入到他笔下人物的灵魂深处，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作家意欲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这就需要去伪存真，在前

10 鲁迅：《〈穷人〉小引》，见《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11 陈燊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1卷》，郑文樾、朱逸森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页。后面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引文仅标注书名、卷数、译者和页码。

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更加细化和深入地进行阅读和探究。

所以,本文主要关注这些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是如何思考和探索罪的问题的?他如何理解和表现人的普遍罪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罪与人的自由、苦难有着怎样的复杂关系?作家所设想的救赎之道是什么?廓清这些问题,就能更好地认识陀氏小说中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更为深入地把握陀氏小说的思想精髓,并经由作家的精神探索去寻求人类面对现实困境的可能性出路。

0.3 研究现状

学界早已看到罪与救赎问题在陀氏的小说创作和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对此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0.3.1 俄罗斯学界的研究

俄罗斯学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罪与救赎问题的研究最为深入,最有代表性的是弗·索洛维约夫、阿·利·沃伦斯基(А.Л.Вольнский, 1861-1926)、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罗赞诺夫、伊万诺夫、舍斯托夫、叶夫多基莫夫(Евдокимов, 1901-1970)、В.В.杜德金(В.В. Дудкин, 1940-)和波诺马廖娃(Г. Б. Пономарева)等人。

弗·索洛维约夫最早对陀氏作品中的罪与救赎问题提出了富有见地的看法。在1881年1月13日悼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中,索洛维约夫指出,陀氏借他的创作始终在宣扬这样一个信念,“任何道德堕落,任何道德卑劣的行径,都不能扼杀人的精神力量”,¹²由此出发才能理解他为何对卑劣的罪人依然怀有同情和爱。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1881-1883)》(Мемориал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три выступления)中,索洛维约夫简要分析了《罪与罚》和《群魔》的犯罪主题,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人民的珍视是基于该民族的负罪意识和领会其他民族精神实质的能力,并认为陀氏是“真正基督教的‘高瞻远瞩的先驱’”,¹³他所提出的救赎之道能够实现

12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3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索洛维约夫的评价定下了后来白银时代陀氏研究的主调。

阿·利·沃伦斯基更多地注意到陀氏小说中人脱离罪恶之后所能达到的精神状态。在发表于1901年的论著《卡拉马佐夫一家的王国》(Карамазова Королевство)中,他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出现的修士群像进行了精彩分析,指出陀氏是通过宗教思想进行艺术观察和写作的作家,佐西玛长老是其着力刻画的“一个获得新生的人”¹⁴和“爱上帝的人”¹⁵,他完全脱罪,达到了神人的最高境界。

梅列日科夫斯基对陀氏小说中堕落犯罪人物的分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专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中,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探索人心最凶险和罪恶的深渊,首先是情欲的深渊及其种种表现”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不可摆脱的需要”,¹⁶他在上帝和撒旦的深渊之间盘桓;其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和伊万都带有反基督的宗教因素,他们的罪恶、“形而上的无耻”造成了灵魂的杂乱与分裂,而梅什金公爵、阿廖沙和佐西玛长老都带有基督的面容,达到了信仰上知与爱的合一。

终生奉精神自由为主臬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Мирозозра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一书中考察了陀氏小说中罪恶主题与自由主题的内在关联。从其一贯独特的对自由的理解出发,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氏的一些主人公跌入罪中是人的原初自由造成的悲剧:“自由使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彼·韦尔霍文斯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基里洛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恶魔般的自由杀死了人。”¹⁷他从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伊万这类有着双重人格的“罪犯”身上看到了人从原初的自由迈向“最后的自由”的受难历程,指出苦难对于这些人物的赎罪和复活具有巨大力量,基督之爱是其最终的精神出路。

14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15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16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卷一),杨德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17 [俄]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罗赞诺夫也同样肯定精神受难所具有的救赎价值。他在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无辜孩童受难”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自身中携带着大量的犯罪性，与它一起还有可怕的罪过性，这罪过性还没有被任何东西赎买……每当我们体验某种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罪过性就获得抵消，某种犯罪就从我们身上离开，我们就感觉到光明和喜悦……”¹⁸在他看来，“孩子的痛苦”既是人之普遍罪性的延续和报应的必然，也是在以“表面上无法理解的痛苦”来洁净和“补充真理”。比别尔嘉耶夫更进一步，罗赞诺夫甚至强调罪恶本身对陀氏笔下人物所具有的救赎意义。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Н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一文中，他指出，当一个人坠入罪孽深渊的时候反而更易于理解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具有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因而当他们在罪中挣扎的同时就显明了一种赎罪的道路，即经由精神受难而重生。¹⁹他认为，《罪与罚》的惟一情节和实质是表现“虔诚”的“杀人凶手”和“圣洁”的“妓女”，陀氏所有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向我们展示了罪恶的不可惩罚性，罪行的无辜性”²⁰。罗赞诺夫对罪恶本身的意义“推崇”到了极致，归结出的“罪的辩证法”极大地深化了对陀氏作品中罪恶思想的理解。

伊万诺夫也论及陀氏作品呈现的“犯罪和报应的观念”，但他更重要的成就是对陀氏笔下人物犯罪根源的阐释以及对犯罪问题同创作形式特征之间关联的分析。他将陀氏对犯罪原因的解释归结为三个层面：上帝和魔鬼在人心的斗争、由激愤的心情产生的感情冲动、生活逻辑不可挣脱之网；“这位首屈一指的深谙人心的大师以上述对犯罪原因的三重研究向我们明白而真实地揭示了在人的遭遇中必然性和自由选择二律背反的结合的秘密。”²¹伊万诺夫进而将这三重原因归结为一点，即信仰的缺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信仰之路和无信仰之路乃是各自遵循其内在规律的两种不同的存在，乃是两种他律或异律的存在……有信仰还是无信仰，因此才会产生误入歧途的犯罪

18 [俄]罗赞诺夫：《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93页。

19 参考赵桂莲：《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102页。

20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

21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92页。

和报复的群体。”²²这一见解无疑是极为深刻、极为正确的。伊万诺夫还注意到，与陀氏对犯罪的这一理解相对应，其长篇小说采用了“刑事侦查的结构”、“法庭记录式的体裁”、“事务性的说明和报道的手法”，²³这种方式有利于作家“窥伺”到犯罪者的行踪和最为隐秘的思想。这为研究陀氏小说的文体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为理解陀氏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同别尔嘉耶夫相似，舍斯托夫也是在其整体的哲学话语体系中来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科学、理性、规律、“一般”、普遍等自明的东西做斗争是舍斯托夫哲学的主要内容，他对陀氏的感发与议论也多循此展开。在为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 100 周年撰写的长文《战胜自明》（*Преодоление Самоочевидностей*）中，舍斯托夫指出，陀氏如欧里庇得斯一样具有“第二视力”，他看到并力图展示这个世界的深层秘密：“我们面临着人们有时不得不陷于其中的最伟大的秘密，——面临着罪恶的秘密……读者也许同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内在努力和奋斗只有一个目的：如果不是了解，那就是开始研究这个秘密。”²⁴对罪恶秘密的洞彻和公开既是陀氏战胜自明性的过程，但又暗含着将个别感受变成普遍真理的建立新的自明性的悖谬。1935 年，舍斯托夫在名为《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Кьеркегорд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报告中指出，人的原罪的实质就是思辨与启示的对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罪人的罪孽和恶习就在其“知识”之中，²⁵梅什金、罗戈任的面具背后隐藏着作家持续一生的努力——克服自明性，人的救赎之道就在于此。

叶夫多基莫夫的《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²⁶一书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处仅有短短几页，但强调了“圣爱”对救赎的意义、“瞬间”的价值，对《卡

22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第 409 页。

23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第 394 页。

24 [俄]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年，第 82-83 页。

25 [俄]舍斯托夫：《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0 页。

26 [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

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情节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解读。在叶夫多基莫夫看来，面对历史根基上的恶，陀氏看到了出自敌基督的基督教乐观主义的悲剧性，但他不是创造善的形象而是用圣像来实现综合和照亮生活。《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之罪由四兄弟来承担，象征着团结、和谐的人类大家庭的解体，阿廖沙的精神之父佐西玛与其肉身之父费奥多尔的对立意味着爱和复活力量同恨与毁灭力量的对立，而阿廖沙最后的发言是罪得赎救之后的最高和谐之音。

当代俄罗斯学者 B.B.杜德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犯罪哲学》²⁷一文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犯罪的论述具有超前性，猜到了 20 世纪犯罪的群体性特征；作家更感兴趣的是谋杀（自杀）的问题而不是其他暴力形式；出色地展示“犯罪行为非理性的、自发的动机”，揭示出“俄罗斯灵魂”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的特征：“‘俄罗斯灵魂’的钟摆在‘十字架和斧头’之间摇摆，在上帝和魔鬼之间摇摆。这个灵魂不可能停留在某个中间地带（杀了人——成为罪人；杀了人——拔腿逃走；杀了人——自杀），因为钟摆的运行轨迹就是不可避免地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²⁸该论者还指出，“犯罪的实证主义”不能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意，作家首先视犯罪为宗教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谋杀进行对等的惩罚方面持有与康德和黑格尔不同的观点”，²⁹反对在折磨原则上建立惩罚体系。这些看法都很切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实际状况。

波诺马廖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Достоевский: Я Занимаюсь этой Тайной）一书中考察了陀氏信仰之道后，着重对他后期六部著作（包括仅是构思而未实际创作的小说《大罪人传》）中的主要人物进行分析。该著作对《死屋手记》中罪犯生活、道德和人性的解读较为全面、深入，对《白痴》中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把握尤其细致入微，注意到她对犯罪事实极为敏感的特性，指出导致其死亡的道德背景在于：“通过罗果仁（即罗戈任，笔者注）和伊波利特这两个被死去的、不能复活的基督形象相关联

27 B.B.杜德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犯罪哲学》，冯华英译，参见张变革主编：《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85-106 页。

28 张变革主编：《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00 页。

29 张变革主编：《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05 页。

的人，思想链条中的一环引向犯罪，引向宇宙计划，引向没有灵性的自然。”

³⁰由于认识到陀氏一生基督信仰的持续性和坚定性，波诺马廖娃极力强调作家为笔下罪人们指出的救赎之道在于建立信仰。

0.3.2 西方学界的研究

西方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罪与救赎思想的关注也由来已久，但大部分研究成果较俄罗斯学界表现出更加理性化和逻辑化的特征。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陀氏的研究表现出更注重宗教哲学方面内容的趋势，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就。

1、英语世界的研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萨娜·布朗克（Ksana Blank）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证法与罪的问题》（*Dostoevsky's Dialectics and the Problem of Sin*）是新近最重要的一部讨论陀氏小说中罪的问题的著作。作者集中分析了陀氏穿梭于对立两极的“矛盾修饰法”，认为陀氏也将此方法运用于罪和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宇宙由正直的罪人和有罪的正直人构成。他的人物倾向于寻求苦难而非幸福，倾向于在羞耻中找到乐趣。他们能同时瞩目天堂的极处和地狱的深渊。在他们心中，爱与恨毗邻，苦与乐相伴，美德与罪相连。”³¹这与巴赫金关于陀氏创作原则的理解及其狂欢化理论遥相呼应。在卡萨娜·布朗克看来，罪在陀氏作品中处于核心地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罪是一切事物的核心，因为它引起了整体的分裂，由此产生了双重性、二元性和二律背反。这种撕裂和分离使人的灵魂、情感和理智经受痛苦，阻碍人们追求真、善、美、自由和爱等最为珍贵的价值。”³²罪甚至具有了救赎维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建立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即人类可以经由罪和犯罪而走向上帝之路。”³³卡萨娜·布朗克也特别关注到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救赎问题。拉斯科尔尼科夫复活新生了吗？在对他最后的话语进行了词源学方面的分析并将他同克里特的圣安德鲁（Andrew of Crete）加

30 〔俄〕波诺马廖娃：《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张变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76 页。

31 Ksana Blank, *Dostoevsky's dialectics and the problem of sin*,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6.

32 Ibid, p.13.

33 Ibid, p.10.